

“双循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 工资水平的影响分析*

郭晓婧¹, 徐 杰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北京 100710;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国向外拓展市场空间的重要途径,会对国内的劳动力就业及工资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稳定增长与国内就业形式严峻的情况下,本文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按照区域、技能水平、企业、行业分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类别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机制分析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行业产值的中间路径发挥效应。在此情况下,中国应从政府及企业层面出发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使跨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刺激国内就业,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力工资水平;跨国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2.5;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5)03-0011-14

一、引言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外部环境的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对外投资合作发展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2]。在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 OFDI)通过资源整合、市场联动等机制,推动国内外要素高效配置、产业链深度融合,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因此,推动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

* 收稿日期:2024-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JY187)“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母国逆向宏观风险与监管体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JY013)“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创新项目“金融数字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转型”

作者简介:郭晓婧(1992—),女,河北邯郸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数字经济、金融风险研究。

徐杰(1972—),女,湖北武汉人;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银行业、货币政策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郭晓婧,徐杰.“双循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3):11-24.

展格局的重要实践。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报可以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逐年递增。2024 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0%,达 1 628 亿美元。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会通过技术溢出、产业链带动、人才回流等路径,对国内劳动力就业及工资水平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会在增加本国就业绝对数量的基础上,促进本国单位资本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3]。但 OFDI 投资动机不同时,对国内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会存在差异^[4]。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影响国内劳动力收入份额。当 OFDI 强度低于门槛值时,对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5],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收入的具体影响及异质性效应需进一步研究。“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同时,又将提升劳动者收入及权益保障水平等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纳入政策目标中。这表明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不仅要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更要实现促进高质量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目前国内学者大多研究 OFDI 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但 OFDI 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需进一步研究,OFDI 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因此,在“双循环”背景下,本文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 OFDI 对母国劳动力就业及收入产生的影响,以往的文献多从就业替代或就业创造视角进行研究。Dunning^[6]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获取资源,对外寻找发展市场。胡立君等^[7]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时,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即母国资本有限时,增加 OFDI 会替代母国的投资及消费,当资金流出不能与贸易出口增加或贸易进口降低抵消时,会对母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王全意等^[8]依据“区位优势”发现中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至东欧和中亚各国,会导致国内就业状况恶化。Kravis 等^[9]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 OFDI 使国内就业规模缩减,劳动密集型活动会随之减少,国内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反而会提高。此外,Blomström^[10]通过比较美国及瑞典的 OFDI 发现,OFDI 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有正有负,而综合效应取决于 OFDI 的产业分布。张海波^[11]选取了 6 个典型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家(地区)为样本,研究 OFDI 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效应,发现不同国家(地区)的 OFDI 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即 OFDI 会促进香港、新加坡的就业,但对韩国、泰国及菲律宾的就业产生替代效应。

从异质性视角分析不同类型的 OFDI 对母国就业及工资水平的影响。从不同投资行业来看,Hi-jzen^[12]发现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使母国劳动力工资差距变大。戴翔^[13]研究发现制造业 OFDI 对母国产生的影响为就业替代,商贸业及建筑业 OFDI 会为母国带来就业创造。进一步研究发现,OFDI 对制造业、建筑业、商贸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对工业及生活性服务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为负^[14];从不同类型的企业来看,市场寻求型企业及技术寻求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劳动力就业影响为正,资源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为负^[4]。程波辉等^[15]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母国就业质量,其中商贸服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促进就业的绝对量,技术投资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促进就业的绝对量与相对量^[3]。Simpson^[16]和袁其刚等^[17]通过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工资水平的关系,得出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工资水平会更高。但 OFDI 对工资水平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18];从不同的投资区域来看,向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为正^[19],且正向“工资溢出”效应呈现为逐年递增趋势。文宏等^[20]通过选取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OFDI 对“一带一路”沿线各省的劳动

力就业及收入份额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李宏兵等^[21]发现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极化现象,但增加对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时,会加剧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在进一步研究时,万晶等^[5]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U型”关系,且市场寻求型与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显著。

综上所述,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较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从就业替代或就业创造的研究视角来看,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会对母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劳动密集型活动会随之减少,国内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反而提高。但也有研究发现,不同经济体 OFDI 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部分经济体的 OFDI 会促进母国就业,产生就业创造效应;从异质性视角依据投资行业、投资企业、投资区域进行分类,发现不同类别的 OFDI 对母国劳动力就业及工资水平的影响不同。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并未得出统一的结论,且大多数文献研究是基于工业企业或上市公司数据库,并未将行业、地区及劳动力个体的数据进行匹配细化研究。随着不同省份、不同行业 OFDI 投资额度增加,各省份及行业 OFDI 对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会有何影响?在中国不断拓宽 OFDI 投资主体,部分省份及主要行业 OFDI 存量额逐年递增的情况下,研究上述问题是我国实施对外投资战略需要考虑的重点。

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将行业、地区及个体层面数据进行匹配细化研究。本文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以下简称 CLDS 数据库)匹配后进行实证分析,从微观视角深入探究中国 OFDI 对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第二,从理论视角剖析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两种路径,并分别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行业产值进行刻画,实证检验 OFDI 影响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现有研究成果。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得出 OFDI 的逆向效应会体现在劳动力就业及工资水平上,本文主要分析三种类型的 OFDI 对就业及工资水平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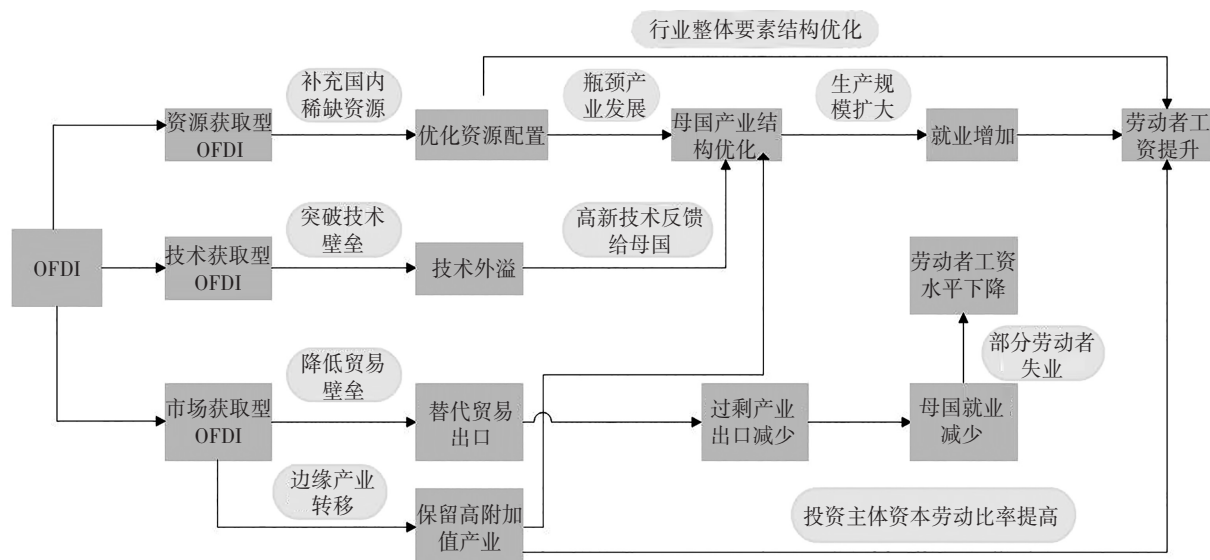


图1 OFDI对国内就业及工资水平的影响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包含资源获取型 OFDI、技术获取型 OFDI、市场获取型 OFDI 三种(见图 1)。资源获取型 OFDI 是一国通过对外寻求稀缺生产资源,补充国内生产原料。目前部分工业行业(比如采矿业、电力燃气等)多以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在一国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对生产资源有较大的需求量并存在资源缺口,对外直接投资可使该国获取有效资源,优化国内的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产业生产规模扩大,促进上下游的关联性发展,丰富其产业链,国内劳动力就业规模扩大、就业需求增加,劳动力工资水平得以提升。UNCTAD^[22]指出技术获取型 OFDI 是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提高发展实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使母国生产技术得以提升,弥补母国技术的不足^[23]。在服务业中,科技服务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高新技术,不仅能够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还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发展中国家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跨国公司或研发机构的方式,嵌入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雇佣东道国的高新科研人才,突破国外技术壁垒,并将企业科研成果及技术反馈母国,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提高跨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跨国企业员工技能结构得以完善,劳动力就业人数增加,工资水平提高。市场获取型 OFDI 是指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开拓国际市场空间,对劳动力就业及工资水平产生两方面影响。在工业行业中,制造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更多的市场空间。一方面,市场获取型 OFDI 可以通过在东道国直接生产销售,规避贸易壁垒,母国部分产业部门出口额减少,相关部门劳动力就业降低,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市场获取型 OFDI 能够加快国内边缘产业及落后产能转移,刺激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国内就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得以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 2 个假设:

H1: 中国跨国企业 OFDI 会使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

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获取资源、拓展市场空间、产生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等,形成了“资源保障—市场拓展—技术升级”的协同机制,可以显著提升国内经济发展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国内经济发展会促使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并通过“人才稀缺性—高价值创造—企业支付意愿”的链条,直接推动工资水平上升。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补充国内稀缺生产资源,获取先进技术,优化本国的资源要素配置及产业结构,提升产品质量、推动行业产值增加。当行业产值增加、行业规模扩大时,意味着企业数量增加或现有企业生产规模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上升。在劳动力供给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企业为了吸引足够数量的劳动者,必须提高工资待遇来增强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H2: 中国跨国企业 OFDI 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是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及行业产值增加效应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且效用均为正。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得出跨国企业 OFDI 会对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产生影响,本部分通过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

通过构建 OFDI 影响工资水平的参数方程^[24],并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与 CLDS 数据库相匹配,得到以下方程:

$$\ln salary_{mit} = \alpha_0 + \alpha_1 \ln ofdi_{it} + \alpha_2 Y_{mit} + \lambda_n + \mu_i + \psi_t + \xi_{mit} \quad (1)$$

上式(1)中, m 表示劳动力个体; n 表示劳动力个体所在行业;被解释变量 $lnsalary_{mni}$ 表示个体 m 在调查年份 t 的前一年在行业 n 的年收入;核心解释变量 $lnofdi_{ni}$ 表示个体所在行业 n 在调查年份 t 的前两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①;控制变量 Y_{mi} 为年收入的个体影响因素,即性别($gender$)、调查年份的年龄(age)、调查年份的受教育年限(edu)、被调查者的工作经验($work$ 用已工作年限表示)、是否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contract$); λ_n 、 μ_i 、 ψ_t 分别指企业层面、省份层面、年份的固定效应; ξ_{mni} 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部分主要是对实证分析的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进行介绍,并对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等进行描述性说明。

1.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如下:(1)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额分别来自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微观层面的个人数据来自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的CLDS数据库。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对CLDS数据库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的数据进行清洗及处理:(1)论文数据保留非农受雇人员样本;(2)数据将年龄限制为18~65岁之间;(3)工资收入去掉极端值情况;(4)去掉信息缺失或不符合逻辑的样本数据。

2. 变量说明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为避免异方差,本文对个人工资、对外直接投资、年龄、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等数值做取对处理。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lnsalary$	个体 m 所在行业 n 的年收入	8 572	4.490	0.359
$lnofdi$	个体 m 所在行业 n 的 OFDI 存量	8 572	6.249	0.812
$lnage$	个体 m 在调查年份的年龄	8 572	3.676	0.286
$lnedu$	个体 m 在调查年份的受教育年限	8 572	1.613	0.473
$gender$	个体 m 的性别(男=1,女=2)	8 572	1.444	0.497
$work$	个体 m 在调查年份的工作年限	8 572	2.408	0.956
$contract$	个体 m 是否签订合同(是=1,否=0)	8 572	0.568	0.495

(三) 实证检验和分析

为研究 OFDI 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本文做出基准回归分析,并分别进行内生性处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及机制检验。

1. 基准回归

通过依次进入模型及共同进入模型的方式做基准回归,OLS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① 因 CLDS 数据库现有信息为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的数据,且调查信息分别为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考虑到 OFDI 影响的滞后性,故取前一期的存量数据。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lnofdi</i>	0.033 1 *** (0.005 8)	0.030 6 *** (0.005 5)	0.030 2 *** (0.005 5)
<i>lnage</i>		-0.059 9 *** (0.019 8)	-0.007 4 (0.020 5)
<i>lnedu</i>		0.213 8 *** (0.019 1)	0.210 4 *** (0.018 6)
<i>gender</i>		-0.141 2 *** (0.006 9)	-0.143 9 *** (0.006 9)
<i>contract</i>		0.099 0 *** (0.008 4)	0.094 2 *** (0.008 3)
<i>work</i>		0.049 1 *** (0.005 7)	0.169 7 *** (0.017 8)
<i>work2</i>			-0.031 5 *** (0.004 3)
<i>constant</i>	4.284 0 *** (0.036 5)	4.203 9 *** (0.103 2)	3.946 3 *** (0.104 4)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i>N</i>	8 536	8 536	8 536
<i>R</i> ²	0.145 0	0.285 4	0.291 7

注:上表回归结果括号内值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 2 将核心解释变量、个体层面特征变量依次放入回归模型。列(2)中对外直接投资、年龄、个人受教育年限、性别、个人工作经验、与单位是否签订合同均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其中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较大,说明这一项存在更大的收入效应。可能的原因是部分行业对学历有高要求,当教育年限更高时,其收入会更高。核心解释变量 *lnofdi* 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 OFDI 对国内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为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会促进国内劳动力收入的增加,此处假设 H1 得以验证。在个体层面的特征变量中,年龄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年轻时,随着年龄增长,收入不断增加,但到中年后,赚钱能力持续下降,此时年龄增加会抑制收入增长;性别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这是因为某些行业对性别会有限定,且男性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女性;签订合同对收入的影响为正,是因为签订劳动合同后,企业需要按照合同约定给员工发工资,若无合同约束,可能会出现工资拖欠等情况,员工收入出现损失。列(2)中 *work* 系数显著为正,列(3)中 *work2*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工作经验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但当工作年限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下降。这是因为达到某个临界点后,随着工作年限进一步增加,劳动者的体力、精力和创新能力可能逐渐下降,从而影响其工作表现和效率。此外,随着劳动力市场变化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一些老员工的技能和知识可能逐渐过时,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

2. 内生性处理

本部分通过工具变量(*iv*)进行 2SLS 回归,*iv* 选取贸易出口额 $\ln ex_{(-1)}$ 。Luo 等^[25]提出贸易出口有助于企业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减少信息不对称,即贸易出口通过积累国际市场经验、降低信息壁垒和构建全球网络,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6]。OFDI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该地区对海外市场前景的预

期^[27]。文中 *iv* 来源于 wind 数据库。数值计算时做取对处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OLS	2SLS 一阶段	2SLS 二阶段
<i>lnofdi</i>	0.030 6*** (0.005 5)		0.291 4*** (0.024 9)
<i>iv</i>		0.087 6*** (0.004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8 536	8 536	8 536
R^2	0.285 4	0.082 7	0.368 8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343.278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357.306
DWH 检验			119.25***

在表 3 中,列(1)为普通 OLS 基准回归结果,列(2)和列(3)为加入工具变量 *iv* 后的 2SLS 回归结果。列(2)为一阶段回归结果,列(3)为二阶段回归结果。由 2SLS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得出 *iv* 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时,本文对工具变量 *iv* 进行豪斯曼检验、工具变量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在进行豪斯曼检验时采用异方差下稳健的 DWH 检验,结果得出拒绝工具变量为内生的原假设;在进行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时,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拒绝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在进行弱工具变量的检验时,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357.306 大于 Stock-Yogo weak ID test critical values 在 10% 偏误水平下的 16.38,因此拒绝 *iv* 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本文对外直接投资内生性的豪斯曼检验显示拒绝原假设,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收入的回归中,对外直接投资为外生变量。列(3)2SLS 回归第二阶段 *lnofdi* 的系数值大于列(1)OLS 回归的系数值,表明 OLS 回归可能低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lnofdi* 的测量方式,将 OFDI 行业存量数据替换为 OFDI 流量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为变更核心解释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得出,OLS 及 2SLS 的 *lnofdi* 回归系数为正,且 2SLS 的回归结果要比 OLS 的结果显著。变更核心解释变量后的 2SLS 回归估计同样通过了豪斯曼检验、工具变量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 4 变更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OLS	2SLS 一阶段	2SLS 二阶段
<i>lnofdi</i>	0.012 6** (0.004 9)		0.299 8*** (0.027 1)
<i>iv</i>		0.085 2*** (0.005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续表4

变量	(1)	(2)	(3)
	OLS	2SLS 一阶段	2SLS 二阶段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8 536	8 536	8 536
R^2	0.282 9	0.070 4	0.390 6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289.932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299.837
DWH 检验			143***

4. 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样本选择对实证结果稳健性的影响,还需分析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性质水平下,各变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1)根据不同区域分组。本文将我国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基于不同区域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ln ofdi$	0.045 0*** (0.007 6)	0.015 9 (0.011 5)	0.028 4** (0.011 1)
$\ln age$	0.013 3 (0.023 1)	-0.023 5 (0.055 6)	-0.003 1 (0.048 5)
$\ln edu$	0.224 9*** (0.011 3)	0.161 6*** (0.048 7)	0.249 2*** (0.020 3)
$gender$	-0.136 4*** (0.008 4)	-0.158 8*** (0.018 7)	-0.168 4*** (0.016 7)
$contract$	0.102 4*** (0.009 7)	0.103 7*** (0.021 4)	0.073 0*** (0.017 2)
$work$	0.0014** (8.68)	0.000 2 (0.001 4)	0.002 1* (0.001 2)
$constant$	3.946 7*** (0.103 7)	4.348 3*** (0.272 4)	4.019 5*** (0.205 9)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5 346	1 601	1 560
R^2	0.316 8	0.207 2	0.298 2

根据不同区域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5)可以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且东部地区的影响比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更为显著。这是因为东部地区企业往往更注重研发投入,对外直

接投资可能促使企业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或服务。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增强企业的市场地位,也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推动工资水平上升。

(2)根据不同技能水平分组。本文将技能水平分为高技能、中技能和低技能三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基于不同技能水平^①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高技能组	中技能组	低技能组
<i>lnofdi</i>	0.039 9*** (0.014 9)	0.019 2* (0.009 8)	-0.015 5 (0.031 4)
<i>lnage</i>	0.366 3*** (0.060 0)	0.058 8 (0.042 4)	-0.087 0*** (0.024 4)
<i>lnedu</i>	1.168 6*** (0.120 0)	0.077 0** (0.033 3)	0.172 8*** (0.024 0)
<i>gender</i>	-0.018 2*** (0.005 0)	-0.134 1*** (0.013 1)	-0.146 6*** (0.009 6)
<i>contract</i>	0.027 9** (0.012 5)	0.091 2*** (0.015 4)	0.090 2*** (0.009 3)
<i>work</i>	0.000 1 (0.001 7)	0.001 9* (0.001 0)	0.000 4 (0.000 6)
<i>constant</i>	0.394 8 (0.329 3)	4.132 6*** (0.182 4)	4.765 0*** (0.219 1)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i>N</i>	2 044	2 043	4 448
<i>R</i> ²	0.879 4	0.252 1	0.231 0

根据表6的回归估计结果可以得出,OFDI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OFDI对高技能及中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为正(且对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为负。一方面,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后,通过技术引进、反向创新或全球价值链整合,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这一过程需要高技能劳动力(如研发人员、工程师)参与技术吸收和转化,同时,中技能劳动力(如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在生产流程优化、质量控制等环节发挥关键作用,对相关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从而提升其工资水平。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部分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如简单装配、基础服务)向海外转移,或通过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出现相对过剩。此时因产业升级和岗位需求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出现下降。在高技能组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高技能劳动力所在行业及单位对学历要求比较高。

(3)根据不同企业性质分组。本文将不同企业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与私营企业、外资与合资企业三

① 根据《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的分类,低技能劳动力是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劳动力,中技能劳动力是指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含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是指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的劳动力。

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基于不同企业性质水平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民营与私营企业	外资与合资企业
<i>lnofdi</i>	0.033 6 ^{***} (0.009 6)	0.023 2 ^{**} (0.010 2)	-0.863 0 ^{**} (0.412 0)
<i>lnage</i>	0.132 9 ^{***} (0.047 9)	0.035 3 (0.029 8)	0.046 0 (0.093 0)
<i>lnedu</i>	0.308 7 ^{***} (0.019 9)	0.216 4 ^{***} (0.014 7)	0.176 6 ^{***} (0.041 0)
<i>gender</i>	-0.126 3 ^{***} (0.016 5)	-0.138 8 ^{***} (0.010 4)	-0.104 7 ^{***} (0.031 3)
<i>contract</i>	0.060 7 ^{***} (0.019 4)	0.111 5 ^{***} (0.011 8)	0.132 0 ^{**} (0.056 4)
<i>work</i>	0.000 2 (0.001 1)	0.000 9 (0.000 7)	0.002 6 (0.002 7)
<i>constant</i>	3.452 6 ^{***} (0.200 9)	4.004 9 ^{***} (0.139 9)	9.636 5 ^{***} (2.729 9)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i>N</i>	2 049	3 310	540
<i>R</i> ²	0.333 6	0.295 4	0.476 1

根据不同企业性质水平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7)可以得出,国有企业、民营与私营企业的 OFDI 对工资水平影响显著为正。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民营与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会接触到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将这些技术和经验带回国内,用于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这不仅直接提高了企业内部员工的技能水平,还通过行业内的竞争和合作,间接推动了国内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工资水平也随之增加。在教育水平方面,三类企业的影响均为显著,再次表明学历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

(4) 根据不同行业分组。本文将不同行业分为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三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基于行业层面^①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工业	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
<i>lnofdi</i>	-0.050 8 ^{**} (0.022 0)	0.047 1 (0.063 0)	0.025 0 ^{**} (0.011 3)

① 本文在对数据进行整理时,删除掉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较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将剩余 18 个行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工业(包含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及供应)、生产性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生活性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续表8

变量	工业	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
<i>lnage</i>	-0.002 4 (0.026 5)	0.063 4 (0.047 7)	0.008 7 (0.038 2)
<i>lnedu</i>	0.197 9 *** (0.013 7)	0.137 1 *** (0.036 4)	0.270 3 *** (0.019 5)
<i>gender</i>	-0.133 9 *** (0.010 1)	-0.159 6 *** (0.015 1)	-0.097 0 *** (0.013 9)
<i>contract</i>	0.109 4 *** (0.011 4)	0.095 2 *** (0.017 3)	0.066 5 *** (0.015 5)
<i>work</i>	0.000 8 (0.000 6)	-0.000 2 (0.001 3)	0.002 5 *** (0.000 9)
<i>constant</i>	4.641 2 *** (0.179 7)	3.930 5 *** (0.467 1)	3.911 1 *** (0.170 4)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i>N</i>	3 699	2 209	2 343
<i>R</i> ²	0.313 9	0.324 0	0.330 5

根据行业层面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8)可以得出,工业样本中 OFDI 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为负,这是因为工业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市场获取型 OFDI,在拓展市场空间的同时,也会产生贸易替代,母国过剩工业企业出口降低,导致国内就业减少,出现就业替代效应,短期内会出现劳动力失业,工资水平降低。生产性服务业及生活性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引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产业升级,创造高附加值岗位,对人才需求层次较高,相应地提供了更高的薪资回报。

5. 机制检验

前文已分析 OFDI 对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的理论线索,但具体的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分析。本部分参考陶锋等^[28]的做法,结合 Kuznets^[29]提出的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有一定的影响,选取两个机制变量进一步分析。其中,用 *lnpgdp* 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用 *lnin* 表示各行业产值。文中机制分析变量 *lnpgdp* 来源于全国各省统计年鉴,*lnin* 来源于 wind 数据库。机制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机制检验

变量	(1) <i>lnpgdp</i>	(2) <i>lnin</i>
<i>lnofdi</i>	0.002 2 ** (0.001 0)	0.007 8 *** (0.001 6)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8 536	8 536
<i>R</i> ²	0.954 5	0.955 9

列(1) $\ln pgdp$ 在 5% 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工资增加效应,列(2) $\ln in$ 在 1% 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工资增加效应,得出跨国企业 OFDI 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及行业产值两个中间路径发挥效应,且影响均为正,符合研究假设 H2。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并从政府及企业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结论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逆全球化趋势增强的情况下,中国 OFDI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基于此,本文通过 OLS 及 2SLS 回归研究 OFDI 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得出:(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国内劳动力收入的增加;(2) 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东部地区 OFDI 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比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更为显著,高技能类型下 OFDI 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国有企业、民营与私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显著为正。在不同行业样本中,工业 OFDI 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为负,生产性服务业及生活性服务业 OFDI 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且生活性服务业 OFDI 的影响较为显著;(3) 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及行业产值两个中间路径发挥效应,且影响均为正。

(二) 政策建议

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下滑,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保持稳定态势,但投资动力不足。在此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我国可从政府及企业层面采取措施,使我国跨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刺激国内就业,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

从政府层面来看,应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支持。第一,应根据国外投资环境制定政策,规范引导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应制定并完善 OFDI 制度,鼓励引导企业“走出去”,并给予企业政策优惠。优化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布局,引导企业实现高效投资,避免出现企业间同质化竞争。第二,政府对企业需采取差异化的扶持措施及扶持力度,对不同企业给予个性化的政策支持,使政策激励效能实现最大化^[30]。比如,对于能够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政府应该给予其税收减免或奖励补贴。对于在国外投资经营良好,能够为企业带来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可带动国内就业、促进工资水平增长的跨国企业,政府部门应给予其奖金激励。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因此对金融业、批发及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可放松政策管制,给予投资指导,充分发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效应,带动国内就业,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

从企业层面来看,需要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根据行业及企业性质寻找 OFDI 市场。第一,企业应培养自身创新能力,提高 OFDI 逆向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当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强时,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更显著,跨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企业员工技能结构得以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就业人数增加,员工工资水平提高。第二,企业需根据行业及企业性质寻找 OFDI 市场,做好投资环境、营商环境等前期调研。当前,中国部分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稳定增长。制造业企业应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开拓国外市场发展空间,加强国内外市场在劳动、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的

互动,优化国内要素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刺激就业并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租赁及商务服务类企业需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国际竞争力,拓展市场发展空间。批发零售类企业应寻求国际市场投资机遇,通过收购及合资等方式进入发达国家,提升企业的对外拓展能力。建筑类企业应持续关注与智能城市及绿色基建相关的境外投资项目,并积极参与投资创新型建筑项目,适应建筑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信息传输、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则需要关注国际市场的动态变化及投资国的行业监管政策,并做出灵活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3] 贾妮莎,申晨,雷宏振,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管理评论,2019(6):49-59.
- [4] 姜青言,杨翠红,田开兰.中国对美 OFDI 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创造还是替代[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9):2277-2289.
- [5] 万晶,周记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吗——基于“一带一路”数据的门槛效应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2):87-104.
- [6] DUNNING J H.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revisited[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86(4):667-676.
- [7] 胡立君,薛福根,王宇.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空心化机理及治理——以日本和美国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13(8):122-134.
- [8] 王全意,刘海云.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三层次论[J].经济问题探索,2004(8):33-35.
- [9] KRAVIS I B, LIPSEY R E. The effect of multinational firms' operations on their domestic employment[R]. NBER Working Paper, 1988.
- [10] BLOMSTRÖM M, FORS G, LIPSEY R 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Home country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7(445):1787-1797.
- [11] 张海波.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例[J].工业技术经济,2010(5):150-154.
- [12] HIJZEN A.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1):188-205.
- [13] 戴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新加坡为例[J].世界经济研究,2006(4):70-76.
- [14] 孙美露,黄烨菁,窦钱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工资的影响:基于母国行业规模的机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22(6):50-61,135-136.
- [15] 程波辉,罗培锴.双向投资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及门槛效应——基于 2009—2022 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24(5):48-58.
- [16] SIMPSON H. How do firms' outward FDI strategies relate to their activity at hom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UK[J]. The World Economy, 2012(3):243-272.
- [17] 袁其刚,商辉,张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工资水平的机制探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5(11):80-89,128-129.
- [18] 阎虹戎,冼国明.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提高员工收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7(11):93-103.
- [19] 毛其淋,许家云.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员工收入?[J].产业经济研究,2014(6):50-59.
- [20] 文宏,辛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11-122.
- [21] 李宏兵,郭界秀,翟瑞瑞.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J].财经研究,2017(6):28-39.

- [22]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EB/ OL]. (2006-10-15)[2024-06-15]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06_en.pdf.
- [23] MAKINO S C, LAU R S. Yeh. Asset-Exploitation versus asset-seeking: Implications for location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3):403-421.
- [24] MINCER J A.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1974.
- [25] LUO Y Q, XUE B H. 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 Experi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1):68-79.
- [26] 崔远森,沈璐敏. 出口经验能助推对外直接投资吗? ——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际商务研究, 2020(3):32-43.
- [27] 董佺,杨清,曹宗平.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人均 GDP 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5):55-58.
- [28] 陶锋,翟少轩,王峤. 数字经济政策与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25(2):118-136.
- [29] KUZNETS 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capital formation and financing[M].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 [30] 王孝松,张瑜. 对外直接投资会挤出国内投资吗? [J]. 财贸经济, 2023(5):161-176.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Labor Wage Leve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 Circulation”

GUO Xiaojing¹, XU Jie²

(1. Institute of Finance &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to build a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a country to expand its market spac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domestic labor employment and wage levels. Given the steady growth of China’s OFDI and the severe domestic employm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OFDI on domestic labor wage level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FD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wage levels. Heterogeneity tests based on regions, skill levels,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reveal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OFDI have varying impacts on wage level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OFDI exerts its effect through the intermediate paths of per capita GDP and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his context,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it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both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levels, enabl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with high quality, thereby stimulating domestic employment and raising labor wage levels.

Keywor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bor wage level;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责任编辑:李栋桦)